燕都

您想了解老北京的风采吗？请看《燕都》！



第三期·1985·12

China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①


②

燕　都

古　貌

1. 拜年
2. 逛厂甸
3. 卖切糕
4. 纸烟年画摊
5. 腊烛摊



③



④


⑤

China

摄影：大卫

登万里长城

康　有　为

汉时关塞重卢龙，　立马长城第一峰。
日暮长河盘大漠，　天晴外部数疆封。
清时堡堠传烽静，　出塞山川作势雄。
百万控弦嗟往事，　一鞭冷月踏居庸。

光绪十四年（1888），正当而立之年的康有为自家乡（广东南海）进京应顺天府乡试。科场失意后，他北游塞上，策马登上八达岭长城。

卢龙，古要塞，在今喜峰口附近，是河北平原通往关外的咽喉要冲。魏武帝曹操东征乌桓即由此通过。八达岭，位于居庸关四十里关沟之北口。此处山势险峻，易守难攻，长城沿岭飞腾而上，直达军都山峰，素有“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之谓，故名“长城第一峰”。

诗人立马要隘，游目骋怀。

天朗气清，古城雄关蜿蜒在千山万壑之中，历历在目；夕阳落处，九曲黄河盘绕于大漠荒沙之间，蔚为大观。兀立在山巅的烽火台堡，已许久不见狼烟腾起了；登台远眺，塞外层峦迭嶂，气势如此雄浑。

劲卒百万，剑拔弩张，当年关山何等稳固；朝政日非，割地赔银，“大清”盛世早成陈迹。诗人只能伴随一轮孤月，催马疾奔，以排遣忧国之愁绪。

这一年秋天，康有为首次“伏阙上书”，但未能上达，反遭非议。他离京南归前赠诗诸友，自况为匡扶汉室的诸葛亮，甘愿做直斥权奸而死的祢衡。十年后（1898年戊戌），维新派终于使变法付诸实施。“新政”虽只维持百日，但毕竟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海波）

燕　都

第三期

1985•12

总第（三）期

编　辑：
《燕都》杂志编辑委员会
出　版：
北京燕山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城府学胡同36号
印　刷：
北京日报印刷分厂
一二〇二印刷厂
总发行：
北京市新华书店
零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日期：
每逢双月出版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096号
定　价：0.45元

京都民俗

巧用蝉蜕妙趣生　李苍彦　1
玩鹰趣谈　刘衡玑　4
老北京人养鸟和斗蟋蟀的嗜好　刘少博　5
猫卧房脊——活受（兽）　崔永福　7
枣树下站岗——早（枣）班儿　刘建业　9
大顺斋和糖火烧　柳　丛　10
全聚德和北京烤鸭　李晓铮　12
话剃头　郝秀竹　14
旧中华邮政发行的三套北京名胜纪念邮票　曹仪简　16
琉璃厂古今谈　朱祖威　18

古迹寻踪

京都名刹法源寺　安　河　19
五塔寺叙说　胡道生　20
漫话达智桥　韩　永　21
刘兰塑胡同名称的来历　刘盛林　22
什刹海畔会贤堂　史明迅　24
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东厂」　履　坚　26
《京华慷慨竹枝词》　贺　海　27
登万里长城（康有为）　李　余　28

旧京琐记

海　波

插四	旧中华邮政发行的三套北京名胜纪念邮票	
插三	真觉寺金刚宝座塔	
插二	老北京的三百六十行	
插一	张锴泥人作品（第四代泥人张）——风筝	
封底	燕都古貌	
封二	郑予鹤泥人作品——阿福	
封面	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朱祖威供稿
国外见闻	骊山与「神女汤泉」	孙贵奇
美术摄影	彩色的吐鲁番	史和平
祖国胜境	辛亥革命滦州起义烈士纪念塔	王羽仪
革命遗迹	访中山行馆旧址	晓宗
宫廷轶事	明代的廷杖	宗同昌
人物丛谈	九莲菩萨——明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	首都博物馆供稿
文物欣赏	谭嗣同与北京	鲁德
	保卫北京的名将袁崇焕	施小楓
	「阿合马案」始末	黄明
	谈南张北溥	史家客
	隋太仆卿元智暨夫人姬氏墓志	铁兵
		王慧琴
		雷大受
		农伟雄
		朱靖宇
		张宁
		邓云乡
		秦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　余

《京华慷慨竹枝词》

我所得的《京华慷慨竹枝词》，是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石印本，琉璃厂开智石印书局印刷，真的是薄薄的只有几页的小册子。作者吾庐孺，显然是个化名。他在序言里自称："仆本闲人，诗无佳句，未尝问俗，曷敢为词？今春风鹤满天，四郊多垒，抚膺三叹，慷慨生焉！于是运龙蛇于掌上，抒垒块于胸中……"顾名思义，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所写的内容意旨有偏激，大雅所难容。"慷慨"二字正好道出这不是一部只写风俗民情的竹枝词，而是着重抨击社会现实的。翻开书一看，果然有不少题目涉及到当时的政治风云和官场生活，甚至写到党会活动。作者在写作时的这种浓厚的政治趣味，使我们联想起清末谴责小说的流行。这也是时势所造成的吧。有些时事性的竹枝词，内容已不限于京华一地了，不过可以看出作者的目光所及，多少表现了清末社会的动荡，如《浙江抢米》、《皖北人相食》、《广东督署被焚》、《吉林大火》等。这类竹枝词显然写得比较空洞，只是记录事件，起个报道的作用，至少作者不能亲历其事。然而写北京的，就生动得多了。如写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一首，那是当时北京最现代化，最豪华的一家国际饭店。作者不是猎奇它的洋味和新鲜，而是非常犀利地讽刺了清廷官员们的丑态："海外珍奇费客猜，两洋风味一家开。外朋座上无多少，红顶花翎日日来。"这是对清末官场生活的写照。现在六国饭店的建筑仍然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当然谈不上豪华了，早已被新的高级饭店所代替。但是，如今个别以权谋私的人是否亦染上了当年官场的遗风呢。

对于当时已经吹到我们古国来的一些新名词，作者也语多讽刺。如写《国民》："当兵纳税是当然，何必要求分外权。国有一钱民一血，犬羊牛马有谁怜？"又如《行动自由》一首："行动于今说自由，欧邻美土复何尤？请看一品当朝者，屠戮人民似马牛。"又一首《大清银行》，把清廷的贪污腐败作了无情的揭露："银行柜里却无金，底事难言直到今。一易监督亏一次，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些，大概就构成他在书名上冠以"慷慨"二字的根据了。写京城风物的，有几首也很好，因为不仅记录民俗，更对世态人情有所褒贬。如《马车》一首："驷马高车意气横，飘风暴雨路中行。从来权势都如此，倾轧苍生总不停。"写《人力车夫》，则带有一种嘲讽的幽默感："短小轻盈制自灵，人人都喜便中乘。自由平等空谈说，不向身前问弟兄。"此外，还有写电灯、自来水、火车、电话、电线、飞艇……这在当时都是新鲜事物，人们都乐于歌颂。这种风气沿袭了好久，我们读民初的一些竹枝词和笔记，少不得会碰上这些题目。

作者吾庐孺究竟是谁，路工同志在把本书辑入《北京竹枝词》时也没有交代。现在恐怕更难查考了。关于记述北京风物史料的书，向来少有人注意，不少已经湮没流失了。已故的张次溪先生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



●贺海●

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东厂」

车水马龙的王府井大街迤北，如今首都剧场斜对面，有一条东昌胡同，解放以前叫作东厂胡同。这条胡同在今天的北京虽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但在旧时的京师，它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它与明代的政治生活紧密相连。明代内廷所设的“内控京师，外涉全国”的最大的特务机构就在这里。

从锦衣卫到东西厂

明代的特务政治在中国封建社会史上是著名的。东厂是明代特务的大本营，这个机构一直延续到明代灭亡。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防范臣民造反，除建立了严密的政治和军事机构之外，并建立了一整套的特务机构，豢养鹰犬，为其伺察、追踪、搏击。初期阶段，这些特务人员叫作检校。当时这些检校遍布于朝廷内外，其职责是专门察听大小衙门诸官吏“不公”、“不法”之事，随时向皇帝报告。不过，检校的品位极低，除伺察、告发人家的阴私勾当外，没有其它任何权利，因此，还不是一个完备的特务组织。

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特地设立了一个完整的军事特务机构——锦衣卫；添设了专门的法庭和监狱，其职权也由侍卫天子扩大到伺察缉捕“盗贼奸宄”（音轨），不仅朝廷内外的文武官员受其监视，就是街坊道途的民间阴私，也在其侦察缉捕之列。当时锦衣卫由皇帝直接控制，它和朝廷的府、部、院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它的最高长官为卫指挥使。由皇帝委派亲信的勋戚或都督一级的官员充任。

锦衣卫自成立以后，恃仗特权，非法凌虐，残酷用刑，干了大量的坏事。因此，到了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曾一度将其撤销，并颁诏朝内外，今后一切案件统归三法司（刑部、都察院、

作，也有一些很有见地的言论，他在所著的《辛亥以来纪述北京历史风物书录》序言中说：“古来纪都邑之书，巨帙易于流传，而零篇短简，往往湮没不为人所重视，故研究北京历史风物，不难于其远，而难于其近者。”我是完全同意这个说法的。象《京华慷慨竹枝词》这样石印的小册子，当年在冷摊上也不过一角一本，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可是它却带给我们多少有益的东西啊。

大理寺）处理。

但是，时隔不久，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为了镇压反对派，又恢复了锦衣卫。以后的几代皇帝，代代相袭，这个军事特务机构也一直延续到明亡。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国都由南京正式迁到北京。朱棣在恢复锦衣卫的基础上，又相继设立了东厂（即今天东昌胡同所在地），由亲信太监掌管，皇帝直接指挥。这个东厂专门"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到了成化十三年（1477年），宪宗朱见深又另立一个特务机构叫西厂，地点在旧灰厂。由大太监汪直直接控制。它的规模比东厂更大，其爪牙比东厂多一倍，自京师至全国各地，无处不有。时间大约五年。到武宗朱厚照即位，又第二次设立西厂。东西厂特务倚仗权势，罗织罪名，诬陷好人，无辜被害者不计其数。从此以后，在明王朝的控制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特务网，用以镇压反抗的臣民。人们当时把这些特务机构并称为"厂卫"，

东厂——人间地狱

自从永乐年间设置东厂以后，这个残酷的特务机构一直由司礼监派出的大太监掌管，称之为"厂公"或"督主"，下面设有掌刑千户和理刑挑选百户各一人。下属的隶役，都是由锦衣卫中最心毒手狠的人来充当。有役长（也叫档头）若干人，率有"番子"（即爪牙）数百人以至千人，分赴各官府衙门和各地从事监视、侦察。

厂、卫与宦官，是明朝的三大害，明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正是依靠了这"三害"镇压反对派，巩固其政权，使这三害有机会沆瀣一气，祸国殃民，无恶不做。

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把持朝政，为了镇压百官，统治人民，东西厂是他利用的专政机构之一。他创立的酷刑规定：犯人不论罪行轻重，一经逮捕，先处杖刑，然后发配边疆，终身充军，甚至戴百五十斤的重枷发遣，使犯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据史书记载：刘瑾当时"分遣逻卒四出探民间阴事，所逮捕一家犯，邻里皆坐，或瞰河居之，以河外居民坐之"。当时这些厂卫特务遍布京师各处，无隙不入，搞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刘瑾为了发展他的统治势力，后又在当时的荣府旧仓地设立了内行厂。

到了天启年间，熹宗朱由校即位。从他十六岁当政以后，即被两个祸国内奸所包围，一是他的乳母客氏（后被他封为"奉圣夫人"；一是大太监魏忠贤。这两人合谋乱秽宫闱，残害忠良，东厂又成了他们的一个得力工具。当时除了东厂拥有的千余个番子四处侦察外，京城里的地痞流氓为了诈取钱财或报复私怨，不少也充当了东厂的帮凶。他们探听到一件事情后，即向东厂役长告密，当时叫"打事件"。役长视其告发事件的大小，付给一定的报酬，叫"买起钱"或"买事件"。尔后，役长就率领众番子至所谓"犯家"，如狼似虎地将其逮捕，投入监狱，严加审讯。

朝廷中各衙门也都有东厂番子监视，甚至连当时的"三法司"会审重案，也必须有东厂的番子在那里监审，叫作"听记"，然后汇报给提督太监。

魏忠贤当时的党羽在天启年间逐渐形成了一个体系，有"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称。对于反对魏党的官民，残酷迫害达到了空前惨烈的地步。当时的东厂设立了许多酷刑名目，有所谓"全刑"，即让犯人受械、镣、棍、拶、夹等五种酷刑；还有断脊、刺心、堕指、红绣鞋（穿烧红的铁鞋）、铜喇叭（用滚油灌入肛门），甚至煮沥青剥人皮。犯人在狱中被折磨得血肉溃烂，奄奄一息。明代的北京，曾发生过两起"六君子"事件。一是天启五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劾魏忠贤三十二斩罪；御史魏大中等七十余人上书参奏魏忠贤祸乱朝纲，贪赃枉法。但昏庸的天启不纳忠言，杨涟等为首的六人终被魏忠贤所陷害，投入东厂狱中，受尽酷刑，每五日拷打一次，每次都是杻、拶、镣、夹、杖等刑罚轮番施用，旧伤未愈，新创复加，到后来审讯时，都无法跪起，只能戴着桎梏平卧堂下，最后惨死狱中。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仅以血溅衣裹置棺中"，令人惨不忍睹。二是天启六年，魏忠贤又兴大狱，逮捕了反对这伙宦官佞臣的周起元、缪昌期、黄尊素等七人。这次的特务侦缉较前更加严密，从被捕人的家乡到京城内外，都布满了东厂的特务，形成了一片阴森恐怖的气氛。被捕的七人当中，除一人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均在狱中受酷刑而死。根据《明史·魏忠贤传》记载："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靡烂……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刳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因此，当时民间有"委鬼（魏忠贤）当头立，茄花（指客氏）满地红"之说。

东厂从永乐十八年建立以后，二百多年间，封

建统治阶级为了镇压人民和排除异己，利用这样一个庞大的专政工具，杀人不可胜数。东厂在当时的一群宦官、佞臣掌管之下，成为屠杀、冤狱、诬陷、迫害的深渊。人们当时一提起东厂，都不寒而慄。

从东厂胡同到东昌胡同

明亡以后，东厂废除，但其名称却沿袭了下来，成了胡同的名称。清代这里已房屋颓圮，杂草丛生，原先"古槐森郁，廨宇肃然"的阴阳界，一变而成了贫民窟、牧猪场、毛革厂。康熙初年，其西部民房被当时的满洲贵族阿兰泰所购买，推土拆旧，建了一处百余间的住宅。到了康熙中叶，此处转手为当时的两广总督、文华殿大学士瑞麟所有。这个人财大气粗，又购进了原先的毛革厂，使东西连成一片，随之大兴土木，除在西部改筑成富丽堂皇的宅邸外，并在东部的大片空地上广植树木花草，并点缀以太湖石、亭台假山，成为一座竹木苍翠，苔藓夹径的精巧园林，取名为"漪园"。后来此地又曾被荣禄、袁世凯和黎元洪先后占据，一度成为黎的私邸。这条胡同就这样经过了几个不同的时代，前后五百余年，直到北京解放。

解放后，东厂胡同逐步地改变了它的面貌，不仅将罪恶的"东厂"二字改成了"东昌"，而且随着市区的城市建设，这里已成为一处整齐洁净的居民区。街道两旁绿树成荫，笔直的柏油路人来车往。那处幽雅怡人的漪园，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所在地。许多专家、学者、研究人员终日在这里埋头书海，探取学问，为发展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而奋斗不懈。今天，生活在幸福宁静中的人们，谁曾想到这条普通的胡同，在北京历史上所经历过的沧桑岁月呢！

● 履 坚 ●

什刹海畔会贤堂

旧京酒楼饭庄鳞次栉比，兴衰更替不胜列举。许多著名的饭庄不仅是历史悠久的老店，而且与近百年中国政治史、文化史有着密切的关联。坐落在绿荫掩映的什刹海北岸的会贤堂，正是这样一个历尽沧桑之变的所在。

旧日北京凡是称之为"堂"的饭庄，大多是一种主要承办大规模筵席，应揽红白大事的地方。一般多有两、三进的院落，内设戏台，能办理堂会唱戏，婚丧典礼之举。至于随意小酌或零桌酒席不过是附带的生意。例如金鱼胡同的福寿堂，取灯胡同的同兴堂，西单的聚贤堂，肉市的天福堂，地安门的庆和堂以及什刹海的会贤堂都属于这一类的饭庄。照顾这一类饭庄生意的大多是权贵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商，同时，也常常是名士文人雅集之所。当年，这些地方的许多聚会，往往都与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史、文化史有关。真可谓是："春盘菜半成名迹，怀壁诗多系史材。"

会贤堂位于什刹海北，银锭桥南，是内城中最北的一处饭庄。据近人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这里本是清末礼部侍郎斌儒的私第，光绪末叶创办为饭庄。会贤堂居于长堤翠柳环抱之中，在风景环境上是得天独厚的。从外面望去，是一幢坐西北而面东南的中式二层建筑，一排十二开间，青砖对缝，画栋雕栏，十分宽敞考究。从大门进去有两进院落，院中有戏台一座，（会贤堂的戏台是没有台柱子和台顶的，只是台上三面有矮栏。可惜这座戏台已在1952年拆毁。）其规模气派在同一类饭庄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坐在会贤堂楼上，可以北望鼓楼、钟楼；南观琼岛白塔。尤其是在夏末秋初，倚窗眺望什刹海的高柳低荷，更别是一番情趣了。

会贤堂开设于清末光绪末年，原属山东帮菜系，后来为了迎合京城人的口味，菜系风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会贤堂也同其他这一类饭庄一样，烹饪技术并无特色，虽用料也是山珍海味，却大多有名无实。主要是以气派和排场招揽生意。会贤堂的全盛时代是在光绪末年到二十年代末这一段时间。除了以上所说的自然环境优美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它与王府为邻。会贤堂西面不远即是恭亲王府，西北则是北府（即醇亲王府）。这些末世的天潢贵胄都是会贤堂的主顾和常客。辛亥之际，醇亲王载沣曾在这召开多次重要会议，商讨"军国大事"。溥仪在逊位之后，为了笼络新贵，还曾派出内务府大臣绍英、世续等在这里专门宴请大总统徐世昌。北洋政府的熊希龄、靳云鹏、朱启钤、徐树铮等也经常光顾。梁启超、王国维、钱玄同、沈尹默等许多文化界的著名人物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京剧大师王瑶卿、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也都曾在这里粉墨擅场。1936年，梅兰芳还在这里演出了一场半途而废的饭庄堂会，记载在他的名著《舞台生活四十年》之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不少进步教授曾在这里聚会，探讨新文化运动的课题。鲁迅在1912年的日记中，曾记载着在这年的夏秋之际去过三次会贤堂。胡适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也曾多次提到过会贤堂的名字。当时，住在护国寺附近的著名书法家、文学家沈尹默更是经常涉足于此，他有一首《减字木兰花》写道："会贤堂上，闲坐闲吟闲眺望。高柳低荷，解愠风来向晚多。冰盘小饮，旧事逢君须记省。流水年光，莫道闲人有底忙。"正是会贤堂当年风光的写照。

会贤堂生意最兴旺的季节是夏秋两季，这是与什刹海的荷花市场有关。逛荷花市场的游人在看了野台小戏、杂耍，听了单弦、大鼓书之后，一般劳动人民多是来碗凉粉，喝杯酸梅汤乘兴而归。而有钱人家则总是顺道来会贤堂品茗小憩或邀朋聚饮，会贤堂前常常是车水马龙，应接不暇。每年这时，会贤堂总是另聘掌灶的，以什刹海中供应的鲜鱼嫩藕招徕顾客，使那种呆板而无味的筵席菜呈现出一些新意和生机。

三十年代末期，随着政治腐败和社会经济的衰落，加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升级，会贤堂生意日渐萧条，勉强维持了几年之后，终于在抗战胜利前夕歇业。不久，这所房子被辅仁大学一部分校友买下，作为对母校的贡献送给了辅仁大学，一度成为辅仁大学的产业。现在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职工宿舍。

在北京的旧式饭庄中，会贤堂是目前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个。不久前，在整修三海，美化首都的活动中，会贤堂那古老的画栋雕栏在经过数十年历史风雨的侵剥之后又重新被油饰一新，内部建筑也大多经过了油饰和维修，焕发出新的光彩。当你站在古老的会贤堂畔，远望钟、鼓楼的碧瓦蓝天，近览什刹海的塘荷堤柳，迎着秋天的飒飒金风，抚今追昔，一定会感慨万千，发出悠悠怀古之情。

刘兰塑胡同名称的来历

●史明迅●

北京西城区西安门大街路北，有一条小胡同叫刘兰塑胡同。从这里经过的人们常常要问：刘兰塑是人的名字吗，这条胡同为什么以此命名？让我们循着史籍提供的材料进行一番探索吧！

清人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说："刘銮塑，俗讹琉璃塑，井一。天庆宫旧为元都胜境，详寺观。"据此可知，这条胡同的名称当与元代寺观"元都胜境"有关，而这里的塑像可能是刘銮塑造的。

元都胜境的塑像究竟塑于何人之手？清人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载此事说："玄（元）都胜境在宏仁寺之西。建于元，相传为刘元塑像。正殿乃玉皇大帝。右殿塑三清像，仪容肃穆，道气深沉。左殿塑三元帝君像，上元执簿侧首而问，若有所疑；一吏跪而答，甚战慄；一堂之中，皆若悚听严肃者。神情动止，恍如闻其謦欬，真称绝艺。"这说明，刘元是元代的一位技艺超群的塑像专家，元都胜境中精美的塑像，便是他的作品。这些姿态生动传神、栩栩如生的人物塑像，受到人民的喜爱。故该书又说："礼旃檀佛者，无不便道看刘兰塑云。盖误元为兰也。"即是说，元都胜境中的人物群像虽然本是刘元塑，但因"元"与"兰"音近而误，众口相传，便将刘元塑说成了刘兰塑。于是这里遂以刘兰塑为地名，约定俗成，历时数百年，至今用之。

按宏仁寺，一名弘仁寺，在太液池西南。清初因移鹫峰寺旃檀佛像于弘仁寺中，故又名旃檀寺，其位置去元都胜境不远。当年人们在旃檀寺礼佛之后，都要顺便到元都胜境观看出自刘元之手的塑像，以饱眼福。

记载刘元生平事迹的书，以元人陶宗仪写的《南村辍耕录》为最早。该书记述了刘元一生的主要经历及其塑像的方法。因其为原始材料，弥足珍贵，故照录于此：

"刘元，字秉元，蓟之宝坻人，官至昭文馆大学士、正奉大夫、秘书监卿。元尝为黄冠，师事青州杞道录，传其艺非一，而独长于塑。至元七年，世祖建大护国仁王寺，严设梵天佛像，特求奇工为之。有以元荐者，及被召，又从阿尼哥国公学西天梵相，神思妙合，遂为绝艺。凡两都名刹，有塑土范金，抟换为佛，一出元之手，天下无与比。所谓抟换者，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俨然像也。昔人尝为之，至元尤妙。抟丸又曰脱活，京师语如此。"

《元史·工艺传》中也纪载刘元的事迹，然多取材于此，但又云：（刘元）"由是命以官，长其属，行幸必从。仁宗尝敕元，非有旨不许为人造它神像。"可见他当时是如何受到元朝政府的器重。刘元的塑像技艺是在继承传统的"抟换"的基础上，吸取了尼泊

尔工艺家阿尼哥之所长，而又有所创新。阿尼哥在年轻时，曾应元朝帝师八思巴之聘，带领工匠到吐蕃建造黄金塔，两年告竣，颇受帝师赞赏，收为弟子，又被推荐到元世祖的御座前，受到器重，至元十九年授工匠总管。刘元向他学习“西天梵相”，融会贯通，遂使自己的塑像艺术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在我国艺术史中堪称独步。除元都胜境外，刘元还曾为元大都的东岳庙塑过像。刘元既注重从我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又吸收外来文化之长，把二者熔为一炉，为我所用。这也许是他在人物塑像艺术方面大获成功的原因吧。

当年的元都胜境，清代易名天庆宫，其位置在刘兰塑胡同北口。然而今已无存，只是在刘兰塑胡同北端，留下了天庆胡同一处地名。它为探幽访古的人们提供了追寻遗迹的线索。清人前因居士《日下新讴》有诗写道：“天庆神模哲匠心，仪容肃穆殿森沉。古传绝艺刘銮塑，元代称名直至今。”注云：“天庆宫神像，系元时刘銮模塑。古穆之中，神情欲活，为古今第一名手。至今其地即以刘銮塑名之。”但诗注有误，刘銮当是刘元的转音，此种“銮”、“元”音误的情形，前人已有辨正，周筼《析津日记》：“京师设像奇古者，曰刘銮塑。说者疑銮与元音近而误。”（《京师坊巷志稿》）故此处之刘銮当是刘元无疑。更多的则是“兰”、“元”相误，王士祯说：“玄(元)都胜境在弘仁寺西，有元人刘兰塑三清像甚奇。”（《池北偶谈》）此即一例。

刘元是我国古代塑像艺术的一代大师，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他的事迹。以这位塑像艺术大师而得名的刘兰塑胡同，是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是人民对他的纪念，同时也是元大都灿烂文化的历史见证。有关刘元的资料目前保留下来的不多，继续收集和整理这些资料，宣传他的艺术成就，这对于开展北京文化史的研究以及对青少年进行热爱首都北京的精神文明教育，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刘盛林●

漫话达智桥

达智桥胡同，位于北京宣武门外，东起宣武门外大街，西至金井胡同。

据考证，北京地名，凡以桥名街的地方，昔时都有水或河道通过，达智桥当然也不例外。《宸垣识略》在卷十“顺承门（即宣武门）西河”条下记载，明正统五年（1440年）天雨连绵，宣武街西河决，漫流成灾，淹没居民。翰林侍讲刘球建议，于城外宣武门桥西，修减水河，以泄城中诸水。经过审议，钦天监正皇甫仲和说，宣武门西旧有凉水河，可疏浚以泄水势。《宸垣识略》按称，上面所说的凉水河究竟在什么地方，已无法辨别所在。又说，“新城（指北京外城）未建时，无地无水，今其故道皆不可考矣。”根据这段记载，再准以地望，达智桥一带或系当年凉水河所经过的地方，这里有桥跨河，后即以桥名街了。又为什么叫“达智”或“炸子”呢？据说是由“鞑子”的谐音雅化而来。据《燕都丛考》一书的序言中说：“……近年来，街市数更，新名林立，如鞑子桥之为达智桥……。”张江裁在前国立北平研究院印行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书后所写的跋语中，也有同样的提法。另外，有人以为达智桥紧临校场，这里可能

曾驻扎过蒙古军队，故名。综观清代各种坊巷籍志，都作“炸子桥”，显然也在避开“鞑子”之贬意。达智桥之称，是民国后才改用的。1965年北京整顿地名时，改称达智桥胡同。

达智桥胡同长200米左右，四米多宽，看来仅仅是一条小巷，但在昔日这里虽说不上“闹市”，却曾有过一度繁荣。就有名的古迹来说，有明代忠烈之士杨继盛（椒山）的故居，名为“松筠庵”，在街的南侧。杨继盛，字仲芳，号椒山，保定容城人，明嘉靖进士，官至兵部选员外。当时正是严嵩专权，杨继盛对严嵩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乃弹劾严嵩十大罪恶。于是，被严嵩诬陷下狱，受尽酷刑，入狱三年终被杀害。临刑前从容赋诗，天下传诵。椒山的夫人张氏，曾上书愿代椒山死，但是这一申请未予通报，在椒山遇难之日，张氏竟于同时自缢。为纪念杨椒山，清乾隆五十二年，就其故居立祠堂。据《京师坊巷志稿》引《啸亭杂录》：“松鹤(应为筠)庵在宣武门外响闸，乾隆丁未胡司寇季堂会诸僚友，醵金立祠，绘公像及同事诸公神位。有古槐一株，忠愍手植。”故居的西南角有亭子，把杨椒山所写的谏草，摹其笔意刻石嵌于亭内，称之为“谏草亭”。现在刻石尚在，但是故居已拆为民宅。目前这一故居已被列为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期早日加以修葺。

另据记载，清末由康有为主持的有名的“公车上书”的万言表，是在松筠庵内起草的。此外，还有一个传说，清末汪精卫谋刺摄政王未遂，被捕后曾在松庵筠内暂囚。

椒山故居对门有朝庆寺，早废；接待寺，明刹。清光绪年间，“汴人就接待寺建嵩云草堂”。据传，嵩云草堂曾是袁世凯的住宅。嵩即是嵩山，在河南省境内，也称中岳。后草堂改为河南会馆，河南中学（又称嵩云中学）设于此。目前这个草堂的前半部已成民宅，后半部为204中学使用，另建了教室楼房，楼门设在上斜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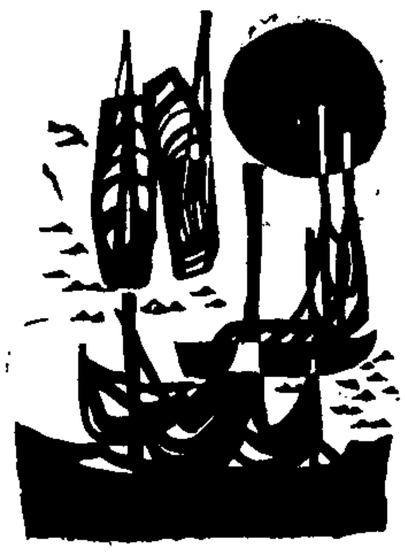
前面说过，这条小巷曾一度繁荣过的另一原因是，清代的北京，凡汉员在内城没有赐第，也不是“值枢廷”的人，一律住在外城，在外城的聚集之处就是宣武门外，即所谓“宣南”。因此，官宦士流云集于此。随之许多有名的餐馆或娱乐场所也多设于此地。据记载，达智桥口内，曾有义盛居饭馆，专营南味菜肴，一些南省京官多饮宴于此。这个饭馆曾与当时南半截胡同内有名的广和居相媲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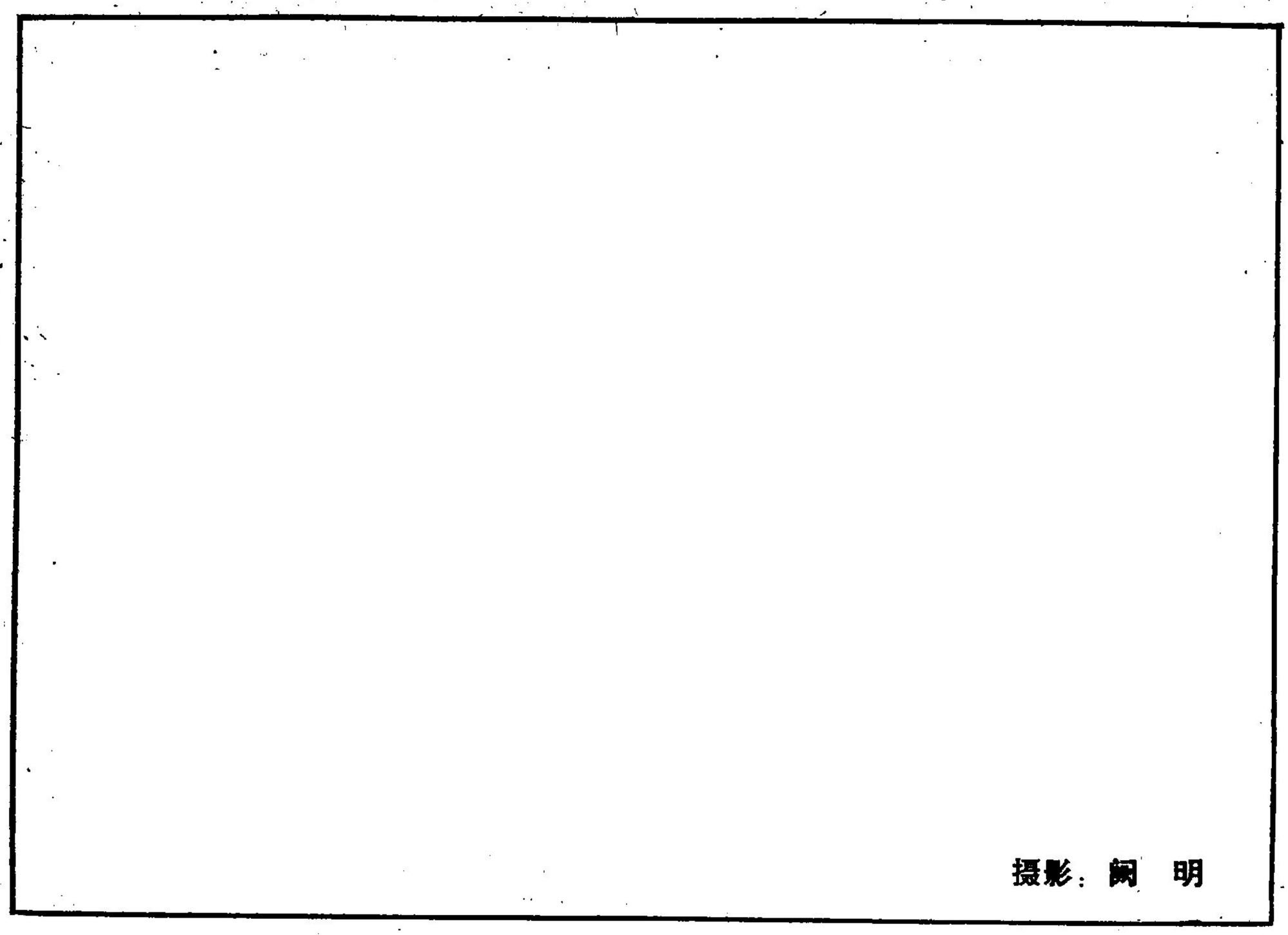
今天的达智桥，仅仅是北京一条普通的胡同，昔日曾是车水马龙，冠盖云集之处呢！

* * *

更 正

本期封二中的“5·腊烛摊”，应为“5·蜡烛摊”。封三中的“潭拓寺”，应为“潭柘寺”。





摄影：阚　明

五塔寺叙说

●韩　永●

距今五百多年前的明代永乐初年，有一位佛教高僧不辞辛苦自西域而来，向成祖朱棣奉呈了五尊金佛像及金刚宝座塔的图样。成祖和他谈经论道十分投机，因而十分喜悦，封他为大国师，授与金印，并赐给他西关（今西直门）外二里处长河北岸的一块地建寺为居，寺名真觉，就是今天的五塔寺。

真觉寺的修建工程直到成化九年才最后完成。建成后的真觉寺内终日香烟缭绕，梵音远播，精美的金刚宝座塔与寺院浑然一体。

清朝乾隆年间，乾隆皇帝为了给他母亲做寿，曾两次重修真觉寺，共费银子六万五千多两。乾隆十六年第一次重修后的真觉寺为避雍正皇帝胤禛的名讳改名为大正觉寺。乾隆二十六年是其母七十大寿。自西安门至西直门街道两旁的铺面整修一新。大正觉寺是做寿的主要场所，寺内全面大加修葺一新。上千名喇嘛被请来念经，同时吹奏长筒短角，一时鼓铙齐鸣，经声如潮，各国使臣都进贡了寿礼，头戴红顶花翎的大臣们奔波在殿前塔后。当时这一切都被绘制在一幅彩画之中，这幅彩画至今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见上期彩色插页），它再现了大正觉寺的全貌。

五塔寺重修时寺内屋顶全部换上了黄色琉璃瓦，在阳光的照耀下殿顶一片金辉，和浓郁的绿荫形成强烈的色彩对比，交映成辉。那时五塔寺前绿水悠悠，塔后青山隐隐，天空白云朵朵，大地草木欣欣。这些景象伴随五塔寺度过了几百个平静的春秋，似乎显示了佛法无边的永恒精神。清朝末年外国入侵者践踏着中华大地，在这场社会的大动荡中，佛祖的力量就显得微乎其微了。五塔寺遭受到致命的打击，一场大火吞没了佛堂殿宇，以

后几经周折，到了民国初年仅剩一塔兀立在一片瓦砾之中。由于无人看管，金刚宝座塔的铜质塔刹多次被盗。出于无奈，北平政府在1937年至1938年间对五塔寺进行了基本修缮。重修后的寺院整体上仍为凸字形，增修了院墙，门楼及门楼两侧共六间南房。院内占地三十亩，举目所至一片荒芜，所幸的是塔前两棵白果树竟躲过了这一场劫难，守护在塔前两旁，树干上的累累创伤似向人们诉说着那些苦难的岁月。

五塔寺因塔而得名，寺内金刚宝座塔就目前来说在我国同类塔中年代最早，样式最秀美，堪称为明代建筑和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中外文化结合的典范。

金刚宝座塔的形式起源于印度。传说佛祖释迦牟尼是在金刚宝座上得道成佛的。五塔代表佛经中金刚界的东、西、南、北、中五方佛主。在印度比哈尔邦南部，矗立着世界上最著名的金刚宝座塔——佛陀迦耶塔。当年西域僧人进奉给朱棣的金刚宝座图样便是仿它而制，不过在兴建时我国古代匠师们没有拘泥于原样而是加以变化，使五塔寺金刚宝座塔熔中印文化于一炉。特别是在前三塔之间加盖了一座重檐琉璃罩亭，这种典型的民族建筑形式不但没有破坏整个建筑的风格，反而使它更具神韵。日久天长，塔身呈现淡淡的橙黄色，在这层素雅的色彩烘托下，亭檐上浓重的黄、绿琉璃显得分外鲜明，使人感到整个宝塔凝重不失其俏丽，淡雅不失其风采。

宝座南、北辟有两个大券门，南门上方有一块明成化九年的御制匾，上书"敕建金刚宝座"。步入门内是一个方形过室，顶部的蟠龙藻井是这座皇家寺院的等级标志。过室以里是一环形塔室，中央是一个方形塔柱，四面各设佛龛供奉着四尊佛主。塔室顶部皆用石发券有力地支撑平台和五座宝塔。过室两侧各建石阶四十四级，盘旋而上便可达罩亭。整个宝座高七点七米，长十八点六米，宽十五点七米。出罩亭可见五塔，一座大塔安居中央，共十三层、高八米；其他四塔各占四角，皆十一层，高七米。五座宝塔都是四体密檐式塔。平台四周围以石栏板，塔上风铃随风而动，丁当作响。塔的外表贴有汉白玉石条，上面雕有不计其数的有关佛教密宗体裁的图案：佛八宝、金刚杵、四大天王及降龙、伏虎罗汉等，最多的是五方佛主的造像，共计一千五百六十一尊。券门上雕饰的是五方佛主的坐骑：狮、象、孔雀、马、大鹏金翅鸟，呈现一幅神话世界的图画。人们可联想到《西游记》中唐僧一行经狮陀国所遇到的三个妖王——狮、象，鹰（大鹏金翅鸟），那便是佛主的坐骑，它们下界闹事几乎断送了唐僧的功果。然而在这里，它们在匠师们的手下却都服服贴贴一动不动，或蹉卧或立在石壁上，小心地侍奉着各自的主人。中央大塔正面须弥座上雕有一双石足，佛教中称佛足石。相传佛祖圆寂之前留足迹于摩揭陀国的一块石头上，后人刻佛足以示敬仰。现在尼泊尔、印度及我国西藏地区常可见到，但在北京地区仅此一处。另外，大量的石刻梵文也是金刚宝座塔的珍贵之处。宝座及五塔的须弥座上枋皆刻有梵文，在北京地区这也是石刻梵文最集中的地方。这些古老的印度文字为文史研究工作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宝塔的通体可谓是无一处不雕，无一处不刻。可以想见当年的匠师们耗费了多少心血才雕琢出这样辉煌的艺术品。

五塔寺安谧清静的环境受到了中外游客的赞赏，游人登塔远眺可将京城景色一览无余，雨过天晴可将西山景色尽收眼底。秋天白果树的落叶把大地铺成一片金黄，夕阳西下余辉象一匹光滑的红绸缠裹着宝塔；月色清明之夜，五座古塔笼罩在一片圣洁的银辉之中，四周一片寂静，只有丁当作响的铃声偶然摇撼一下沉沉的夜幕。此刻才能使人们记起不远处就是繁闹的都市……

五塔寺在都市的一角，京西一隅，一条古老的高梁河从门前淌过，它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

摄影：大卫

●胡 道 生●

京都名刹法源寺

首都北京是名闻世界的历史文化都城，名刹甚多。坐落在宣武区教子胡同南头东侧的法源寺，就是北京现存历史最久的名刹之一。

法源寺原名悯忠寺，相传系唐太宗李世民为悼念东征阵亡将士而建。历经辽、金、元、明、清各代约一千二百多年，中间屡遭自然与人为的损坏，最严重的一次大破坏是辽代清宁三年的大地震，整个寺院成为瓦砾。大约经过近五十年的时间，才把整个庙宇恢复起来。明、清两代不断修葺，今日现存法源寺的规模，实际上就是辽代道宗时重修的布局建筑，只是周围环境略有收缩。

金元明清各朝时，寺庙都有所损坏，但也有所增建，不伤大局。清代顺治时增建了戒坛，康熙时重建藏经阁。到了雍正时又重加修缮，工程较大，修葺比较彻底，改寺名为法源寺。今日看到的法源寺也可以说基本上是清朝重加修缮后的面貌。

解放前夕，法源寺被国民党军队占据，停灵闲房住上居民，受到一些损坏。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文物宗教政策，根据中国佛教协会的申请拨款

对这一历史名刹加以修葺，力求恢复原貌。法源寺真正大规模地开展对国际的交往乃由此开始。为了迎接一九六三年亚洲十一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会议，还改建了会议厅，安装了暖气卫生设备，后来唐僧玄奘法师的骨灰盒也供奉在法源寺。由于贯彻了宗教政策，对信奉佛教的国家和人民来说，法源寺在国际友好往来中发挥了它的作用。

当时庙宇是红色山门，左右石狮两座，门额上镶着大理石雕刻的着金色的法源寺三个字，显现出一派古老寺庙的风貌。一进山门，鼓楼前有文官树一株，树高叶茂，二门两侧种植有北方罕见的小竹林，猗猗绿竹使法源寺显得格外庄严雅静。天王殿迎门是弥勒菩萨化身布袋和尚像，笑脸迎人现欢喜相，背后韦驮坐像与两壁四大天王像，现猛勇威严相，威风凛凛，前后塑像对比鲜明。天王殿后为大雄宝殿，内供奉华严三圣，两厢列十八罗汉，系金漆木雕造像，都是塑像中的珍品。殿的周围花木繁多，有唐松宋柏，其中白皮松一株是元代之物。后院的银杏树也有几百年的经历。法源寺的丁香驰名远近，有白丁香，紫丁香三百余株，盛香开时香气浓郁，飘香数里，附近住户多闻其香，真是“海内无多地，人间别有天，风吹花雨落，梵音有花香”。可惜在十年动乱期间，它遭到大破坏，即以扫四旧为名，把庙宇房上的屋脊六兽、地上的唐宋古碑、殿里的佛像塑雕珍品、殿外的丁香绿竹等全部捣毁、把外国僧侣贡献给法源寺的用金、用血手抄贝叶经也全部烧毁，古瓶古物损毁更多。这种人为的破坏和损失程度仅次于道宗清宁三年的地震和明初的兵燹，十分令人惋惜。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中国佛教协会再一次申请，再一次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拨出巨款再度重修，力求恢复原貌，并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位单之一，重新栽培丁香、牡丹各种花木。全部庙宇的修复工作费尽心血，不仅恢复很快，而且对修葺古建筑，做到保存古刹风貌，不辜负当年匠师们苦心经营的意境，保存了法源寺古物建筑的精湛艺术，展示了我国古代文化艺术和建筑的高超成就。

法源寺的国际文化交流比过去更加繁多，1981年接待了鉴真和尚法像的回国探亲活动，并在法源寺内举行了纪念仪式，参加盛典和参观的人士达数万之众，也是中日友好往来的一件值得歌颂的佳话。使这千年的古刹发挥它的作用，并成为开放参观游览的名胜场所。除星期三外都对外开放。

法源寺不仅修复了建筑，而且恢复了中国佛学院，由赵朴初任院长，明真和尚为副院长，还增设了中国佛教图书馆，集中了一些国内名贵佛教艺术品与书籍，使它成为一个佛教艺术和文物展览品的中心。展出的房山石经，在金石、书法、政治历史、社会经济等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丰富的历史资料，例如著名书法家董其昌于明崇祯四年三月四日书写的宝藏二字，苍劲挺秀，十分吸引观赏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